

图鉴版

新编

上下五千年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

第一节 秦朝创建

秦族渊源

秦代王朝的创立者——秦族，本是夏族的一支，即羌族的苗裔。这个种族，原住鄂尔多斯的原野，大约在旧石器时代的末期，其族类即溯黄河而西上，缓缓向甘肃西南移徙。到新石器时代早期，或已定住于甘肃西南黄河河谷洮河河谷一带，开始了植物栽培与动物驯养的生活。但直至此时，秦族并未从羌族中分化出来，所以尚无秦族之名。秦族之从羌族分化出来，那是有史以后的事。

秦族之离开今甘肃西南而东徙，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，即传说中之“尧、舜、禹”时代。当时沿渭水而东徙的羌族，除秦族外，尚有其他诸羌之族，其中首先进入中原的是周族。周族入据中原以后，遂称后来东徙诸羌曰西戎，以别于甘肃的诸羌。实则所谓西戎，就是诸羌的别称。秦族为东徙诸羌之一，故亦称秦戎。大约就在新石器时代中期，秦族的前锋，即已到达陕西境内，与东夏之族发生接触。到新石器时代晚期，其族类遂分布于今日陕西西部。

以后，由于殷族在东方之勃兴，占领中原，西报诸羌，秦族亦与诸羌同时沦为殷代奴隶国家的臣属。大约即于此时，秦族即通过奴隶制的文明，走出了历史上之野蛮时代的境界。

即至周族克殷，陕西的诸羌，在周族领导之下，大半先后东徙中原。其残留于陕西的诸羌，即被周族称之曰西戎。秦族之中，也有一部于周初东徙中原。此等东徙中原的秦族，以后



嬴政（前259—前210）秦朝建立者，即秦始皇，前216—前210年在位。



在周族封建文化影响之下，与周族同化。其留在陕西境内的秦族，则沦为周族的臣属。

在周穆王时（公元前 1000 年左右），分布于陕甘边境的秦族又有一支东渡黄河，徙于汾河河谷，这就是传说中所谓造父之族。造父之族，其前锋似曾达到淮河流域。但直至周孝王时（公元前九世纪左右），秦族的大部分族类，还是与诸戎杂处，游牧于犛渭之间。

到周厉王时（公元前 841 年前），陕甘一带，袭来了普遍的大旱灾。诸戎之族，遂驱其畜群，东向就食，时秦族亦有其内。周宣王时（公元 827 年至 782 年），周族已感到诸戎的压迫，乃运用以戎制戎的政策，封秦族的酋长秦仲为大夫，使之抵抗其他诸戎。秦仲不久死于火并战争之中，其子继之，仍为周族的西垂大夫，是为庄公。庄公在周族支持之下，继续与诸戎相抗。

周幽王时（公元前 781 年至 771 年），陕甘一带，又袭来了空前的大旱。当此之时，诸戎之族冲破了周族西北的封锁线，闯进陕西的腹部。其中犬戎与申戎，且攻陷西周的首都，杀死幽王于骊山之下。当时，秦襄公站在周族的方面“将兵救周，战甚力，有功。”然而终于不能阻止诸戎东徙的猛潮，所以到平王时，周族遂被迫放弃陕西，东迁洛邑（今河南洛阳）。据《秦本纪》云：“（当时）襄公以兵送周平王。平王封襄公为诸侯，赐之岐（今陕西岐山县）以西之地。曰：‘戎无道，侵夺我岐、丰之地。秦能攻逐戎，即有其地。’与誓封爵之，襄公于是始国。”由此看来，秦族的始建国，乃在西周末叶。

春秋初，陕西全境，已成为诸戎驰逐之场，而秦族于诸戎中，最为强大。他占领了犛渭之间土地肥美的河谷，这里，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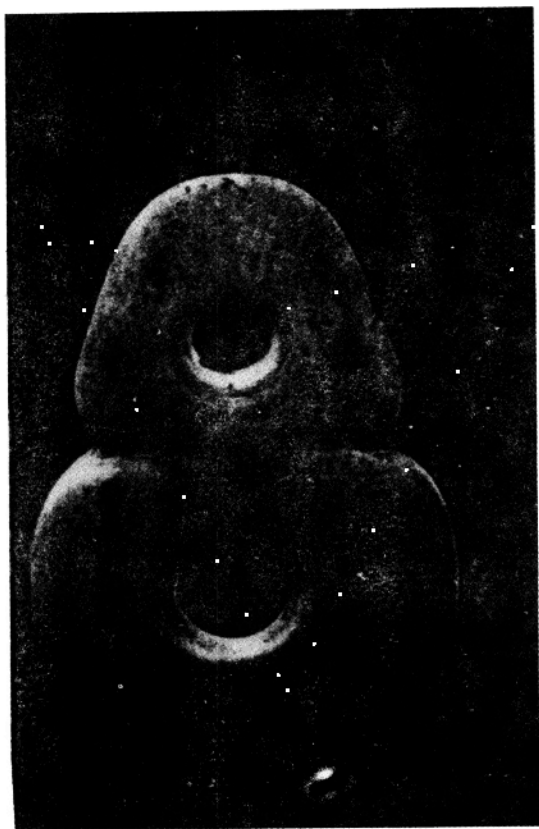
青玉马蹄形器



但水草丰富，宜于畜牧，而且是周族文化发祥之地，有着繁荣的庄园农业和手工业的存在。秦族既据有优越的自然条件，又因袭周族的文化遗产，同时，更以其氏族制的历史活力，注入于周代封建文化之中，故在春秋初叶，勃然兴起，征服邻近诸戎，成为当时西北的一个新兴的力量。他把诸戎的土地，收夺为县邑，诸戎的族类，转化为农奴，逐渐把诸戎的社会经济，推向封建主义的历史边缘，并从而使诸戎之族，在封建地方关系之中，化除其种族的界线，融解于秦族的封建国家之中。所以西周时的诸戎，不复见于春秋中叶以后，这并不是诸戎之族为秦所灭绝，而是与秦族混而为一了。

秦族就在不断的征伐战争中，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。到繆公时，这个国家，便西并诸戎，把他的领土，西展至陕甘边境，北拓至陕西北部。同时又东灭梁、芮，打通进出中原的道路，并进而伸张其势力于中原。有名的韩原（今陕西韩城西南）之战，正是秦国势力昂扬东进的开始。惟当时晋国强大，仍为秦国东进的阻力，所以到康公之世，秦国便以全力打击晋国，他一败晋于令狐（今山西临猗西），再败晋于武城（今陕西华县东），三败晋于鞏马（今山西永济南），四败晋于河曲（今山西芮城县风陵渡一带），把晋国打得落花流水。降至战国初，韩、赵、魏三分晋国，秦国的东线，解除了威胁，于是秦国在这一历史间隙中，征服了陕西全境的诸戎，并进而征服甘肃东北及汉中一带的诸羌。从此以后，秦国便以日益高涨的压力，侵陵中原诸国。

秦国之走上新的历史发展阶段，始于孝公时代（公元前361年以后）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云：“孝公元年，河北以东强国六，与齐威、楚宣、魏惠、燕悼、韩哀、赵成侯，并淮泗



青玉双联璧



之间小国十余。楚、魏与秦接界。魏筑长城，自郑宾洛以北，有上郡。楚自汉中，南有巴、黔中。周室微，诸侯力政，争相并。秦僻在雍州，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，夷翟遇之。”由此而知当时秦国已与六国诸侯，形成一种对垒的形势（插图一，见7页）。但是当时中原六大强国的社会内部，已经展开了新旧土地所有者的矛盾斗争，新兴的商人地主，正要求摆脱旧领主的束缚，建立封建主义的新体制。但当时六国旧领主，根深蒂固，正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秦国为一新兴的国家，并没有传统的历史束缚，所以新兴的商人地主，首先在秦国获得了政权。商鞅变法，正是秦国历史之新的转向的表现。所谓商鞅变法，就是变封建为郡县，变庄园为佃耕，变力役地租为现物地租。由于变法的结果，于是更提高了秦国社会的生产力，由此而超越了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。所以史称孝公之世，“民以殷盛，国以富强，百姓乐用，诸侯亲服，获楚魏之师，举地千里，至今治强”。

秦国自变法以后，他就变成了六国中新土地所有者反对旧领主的堡垒。因而以前种族的对立，到孝公以后，便一变而为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对立。一方面新的土地所有者，以秦国为支柱，组织了反旧领主的连横派；另一方面，六国的旧领主，也组织了自卫的合纵派。这两派，在战国中叶以后，展开了剧烈的斗争。所以自孝公以后，秦与六国的斗争，就是新旧土地所有者的斗争。

历史发展的原理，决定了这个斗争的结局，是新的土地所有者的胜利，所以秦自孝公以后，便以压倒之力，东向中原。“当是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，皆明知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重士，约从离衡。并



青玉三联璧



韩、魏、燕、楚、齐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谋，齐明、周最、陈轸、昭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，吴起、孙臆、带佗、儿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朋制其兵。常以十倍之地，百万之众，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，九国之师，逡巡逃遁而不敢进，秦无亡矢遗镞之费，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解，争割地而奉秦，秦有余力而制其敝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万，流血漂卤，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河山，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。”这样的事实，就充分地证明了，任何主观的企图，都不足以倒转历史的车轮，秦与六国的斗争，正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

据史载，秦至惠王之世：“用张仪之计，拔三川之地，西并巴、蜀，北收上郡，南取汉中，包九夷，制鄢、郢，……”至于昭王，秦国的势力，遂深入黄河腹部，臣服韩、魏，挟制东周，东逼齐、鲁，北临燕、赵，南窥荆楚，西略巴、蜀，伐巫郡，远至于黔中。于是秦国不仅把中原诸国，置于其控制之下，而且伸张其统治于川黔一带。

到秦始皇时，“秦地已并巴、蜀、汉中，越宛有郢，置南郡矣；北收上郡以东，有河东、太原、上党郡；东至荥阳，灭二周，置三川郡。”当此之时，中原六国，已如盛开之花，临于萎谢；而秦国则如暴风雷雨，闪击中原。于是“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。”在初期封建社会的废墟上，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帝国。

横扫六合

战国时代的特点就是各国诸侯争夺土地人口的兼并战争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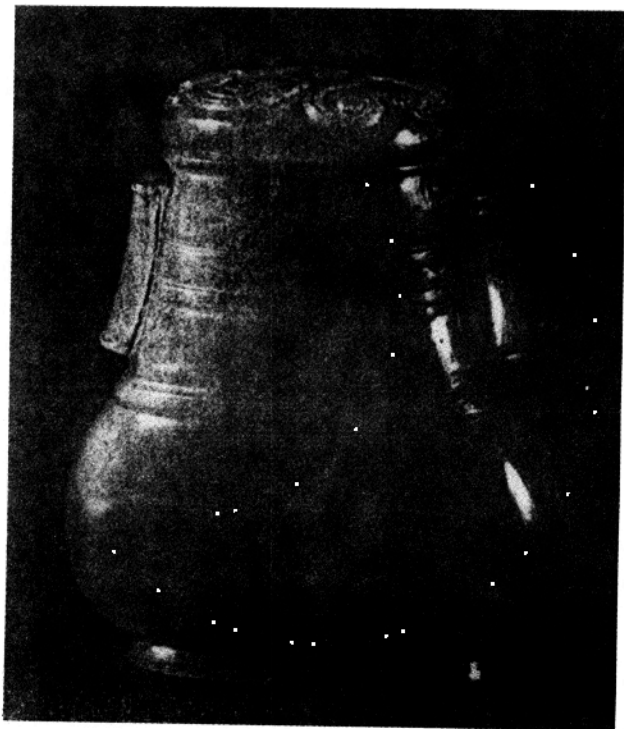


跪坐俑



年不断，战祸极其残酷。“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当时的军队与盗匪没有什么不同，他们一进入别国领土，就割掉庄稼，砍伐树木，破坏城市，平毁沟池，焚烧房屋，抢劫牛羊，敢于反抗的民众被杀掉，被迫屈服的便捆绑带回作奴婢。到了战国晚期，中小国家基本上全被吞并，只剩下七个大国，战争规模却越来越大并且更加残酷。“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（楚），五年乃罢；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，五年乃归。”（《战国策·赵策三》）韩魏两国连年遭到秦军进攻，被屠杀的青壮年尸骨暴露全境，被掠卖流亡的老弱充当奴婢布满天下。据说秦赵两国间的长平之战，前后相持3年，赵军总共被歼灭45万人，秦军也伤亡过半，出现了国内空虚的局面，两家损失都很惨重。所以当时人们就指出，这种兼并战争是国家的大灾祸，战时消耗大量人力物力，战后安葬死者、医治伤者、慰劳幸存者、补充武器装备等等，官府和民众公私双方的损耗，十年的农业收入也补偿不起来。他们认为战国的世道混乱已极，人民的痛苦也无以复加了。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，所以大国欺侮小国，战乱不休。他们因而呼吁，要想天下安宁就必须统一。

不但政治上需要统一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提出了统一的要求。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中心区，对于黄河的治理特别需要统筹全局妥善安排。早在春秋初年齐桓公召开的葵丘之会，就规定禁止各国修建危害邻国的堤防。但是战国时代各国兴修水利却大多是损人利己，不顾后果。比如齐国与赵国、魏国以黄河为界，赵魏地势高，齐地势低。齐国就修筑堤防，把河水挡过去冲刷赵魏，赵魏也筑堤防驱迫河水流回齐国。不仅两岸有矛盾，上下游的冲突更尖锐。当时黄河中游有两个小国



贯耳玉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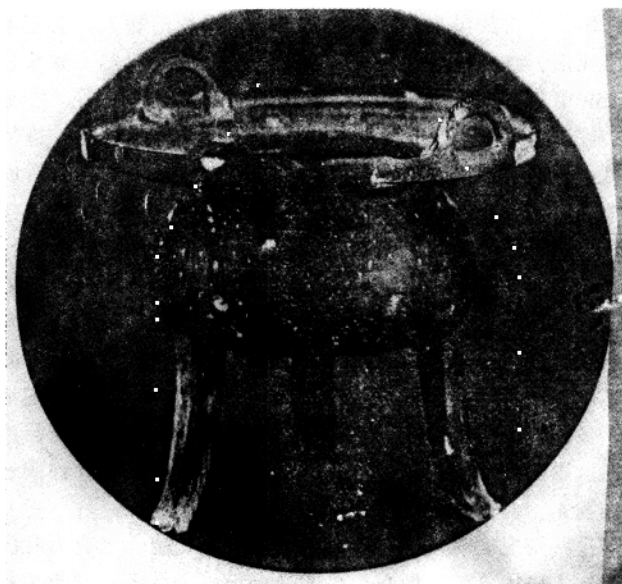


东周和西周，西周在上游，东周在下游。东周想种水稻，西周却不放水下去。有人还建议在东周改种小麦后再放点水给东周，破坏并诱使东周改种水稻，然后利用掌握水源来控制东周。所以孟子指责当时许多水利工程是“以邻国为壑”，就是把邻国作为排放洪水的溢洪区，把灾害转嫁给邻人。甚至不顾人民死活，在打仗时把河水作为进攻或反击的武器。如像公元前359年楚军攻魏，就决黄河水淹没魏国长垣周围。公元前332年齐魏联军伐赵，赵国也决黄河水去灌齐魏联军，迫使其撤退。这样必然破坏黄河水系正常流通，造成严重后果。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，这个问题显然也是无法解决的。

战国时代的商业活动也有相当的发展，如像北方的骏马、猎狗，南方的鸟羽、象牙，东方的鱼盐、纺织品，西方的毛皮等都在中原流通。所以水边的人有足够的木材，山上的人有充分的水产，农民不必做木器炼铁窑可以得到各种用具，工商业者不用耕田种地也有足够的粮食。但是在诸侯割据称雄的情况下，各国度量衡制度不一样，货币也不统一，给商品交换带来不便。更困难的是各地关卡林立，捐税繁多，还有种种额外的敲诈勒索，对商业活动危害极大。

这些情况表明，当时的中国需要统一，统一已成为时代的要求，人民的希望。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，只能是通过征服活动来实现统一。

战国七雄都在追求统一，而有远见的一些人早就看出秦国独具有利条件。在战国晚期它是比较先进而富强的国家，在政治上、经济上、军事上，都比东方六国占据显著的优势。本来秦国僻处西陲，中原诸国开初瞧不起它，甚至不许它参加各国的盟会。直到秦孝公（前361—前338）任用商鞅变法，打击



黑陶盘口鼎



奴隶制残余势力，猛烈的推进封建地主制，移风易俗，才打下富国强兵的良好基础，并逐步向东方发展。其后秦惠王、秦昭王继续扩张，一变而成为先进的强国。战国末年的荀子曾经指出：秦国民众纯朴服从，官吏奉公守法，政府办事效率高，是近乎理想的政治。秦国的军制也能够驱使民众勇敢战斗，追求立功受赏，比齐魏的军制优越。加之地理条件有利，农业生产技术先进，用牛耕田比较普及，物产丰富，又能利用水道漕运粮食，保证供应，所以秦军常打胜仗。这说明经过商鞅变法，秦国社会制度先进，上层建筑基本上能适应社会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，所以进展迅速，后来居上。

秦昭王晚年，大商人吕不韦插手秦国政治，把一个落难王孙捧上了国王宝座，这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。吕不韦也得以升任秦国丞相，封文信侯，掌握大权。过了三年庄襄王死去，年仅13岁的太子政继位，当时称为秦王政，国事仍由吕不韦主持。吕不韦是当时颇有政治才能的人物，他利用秦国传统优势，积极推进蚕食六国的统一活动，对秦国的发展曾作出贡献。但是秦王政一天天长大，权力之争逐步激烈。秦王政九年（前238），22岁的秦王政举行冠礼，亲自掌权，吕不韦从此失势，终至被迫自杀。到这时，通过孝公以下六代的扩张，秦国已夺取了许多战略要地和大片富庶地区，占据了当时中国约1/3的土地，约3/10的人口和约6/10的财富，形势极为有利。但是，如果战略错误，使东方六国真正联合起来对抗的话，也存在失败的可能。这种前景并不是过虑，就在秦王政掌权之前三年，楚赵魏韩卫五国还曾联合攻秦，虽然由于五国内部矛盾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，却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

因此，秦王政亲自主持国政之后，立即采用尉繚和李斯的



印纹硬陶瓿